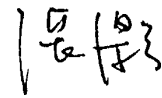


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



從宏觀去看，中國歷史自十世紀至二十世紀以前，一共只有過兩次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紀的王安石變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這兩次改革最後都失敗了。王安石改革的失敗反映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缺乏自我轉化的能力。戊戌維新失敗，不但再度證明傳統體制缺乏這種能力，而且也把中國帶入一個空前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今天我們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必須以這雙重危機為視野去下手分析。

大約說來，戊戌維新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緒皇帝以一連串的敕令推動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所謂的「百日維新」；廣義是指1895-1898年間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始於甲午戰敗之後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呼籲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維新後發生的宮廷政變結束。我在這篇文章裏所討論的是廣義的戊戌維新。

這個廣義的戊戌維新不是單純的政治改革運動，因為康梁集團從開始就計劃循兩種途徑進行改革運動。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徑，也就是說，希望透過向朝廷上書建言，改變清廷的政治立場與態度，然後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來實行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徑，也就是說，企圖針對社會菁英份子——士紳階層，從事游說鼓動來爭取改革的支持^①。由於這雙管齊下，維新運動得以凝聚《馬關條約》後中國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憤慨與求變心理，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波瀾，在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些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去探討其歷史意義：一，從政治史去看，它代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開始解體，從而引進了一個中國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機；二，從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戰爭以後，開啟了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時期。

戊戌維新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緒皇帝以一連串的敕令推動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所謂的「百日維新」；廣義是指1895-1898年間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始於甲午戰敗之後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呼籲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維新後發生的宮廷政變結束。

一 戊戌維新運動與中國政治秩序危機的序幕

在說明為何戊戌維新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演變中有這樣的歷史意義之前，必須先對傳統政治秩序的定義稍作交代。這個政治秩序是在北宋開始出現而定型

於明清兩代，它的核心是由傳統政治制度的兩個基本結構所組成。一個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漢初期的「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ship)；另一個是晚周戰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官僚體制」。但是要認識傳統政治秩序，我們不能只看政治制度，因為這政治制度是受着兩種來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撐。一方面它受到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幹——士紳階層的支撐；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傳統文化體系的核心——正統儒家思想的支撐。後者以綱常名教的觀念為主軸，對現存的朝代政權不一定無條件地接受，但是對於政權後面的皇權制度則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統儒家的政治社會價值，自唐宋以來已經逐漸滲透入佛教與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會價值上已經「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②。因此儒家的綱常名教觀念，可以代表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的正統價值。總而言之，在明清兩代，傳統政治秩序是皇權制度與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幹，以及傳統文化體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組合。

在明清兩代，傳統政治秩序是皇權制度與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幹，以及傳統文化體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組合。這種三元組合在1895年前並未有解紐現象，1895年以後則有着顯著的變化。首先，三元組合的傳統秩序逐漸解紐，普世王權隨之瓦解，接着新的共和政體頻頻流產，中國終於陷入徹底的政治解體。此後，開始了綿延30年的政治危機。

這三元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重要的是：大致說來，在1895年以前，這衝擊並未撼動政治秩序三元組合結構，只是導致官僚體系潰墮。這一觀念上的分別對我們了解近代政治變遷極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應付外強侵略與內部動亂而作的制度改變與調節是限於行政管理層面，並未觸及基本政治體制。不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曾有督撫分權的現象出現，但所謂的督撫分權只是清廷為了應付內亂後的變局的權宜之舉。在基本權力上，這些久任的督撫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並不能與清廷分庭抗禮。關於這一點，劉廣京先生已有極肯要的說明③。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失控與地方分權的趨勢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國變成大一統的帝國以後每一主要時期都曾出現過的現象。秦漢帝國晚期的州牧坐大與隋唐帝國晚期的藩鎮跋扈都是極明顯的例子，而晚清這種趨勢的嚴重性是遠不能與前二者相比的。那時督撫分權只代表行政結構鬆弛，而前二者則已威脅到當時的中央皇權統治。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清朝中央政府與士紳階層之間的關係在太平天國所開啟的內部動亂時並未受到影響。最有力的證據是當農民運動在咸同年間威脅到清朝皇權統治的時候，當時的士紳階層在地方上響應曾國藩保衛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號召，招募團練，支持清朝中央政府，而清政府最後之能扭轉危局，鎮壓農民運動，士紳階層的有力支持是一個決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儘管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已有半世紀以上，正統儒家思想仍然能夠維持其在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當時所謂的「西學」的影響大致局限於沿海的幾個大商埠，對於大多數的官吏士紳並無甚麼影響。1895年以前，中國的重要書院幾乎都沒有西學的蹤迹，可為明證④。同時，考試制度仍然維持它在中國社會與教育上的壟斷地位，使得當時大多的士紳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書的思想籠罩之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皇權制度不但仍然與社會主幹保持互相依存的關係，而且也依舊受到文化傳統的主導思想的維護。也就是說，傳統政治秩序的三元組合在1895年以前並未有解紐現象。

這種情況在1895年以後有着顯著的變化。首先，三元組合的傳統秩序逐漸解紐，普世王權隨之瓦解，接着新的共和政體頻頻流產，中國終於陷入徹底的政治解體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這一綿延30年的政治危機的起始點，就是甲午以後所發生的維新運動。

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維新而論，它代表改革運動已進入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光緒皇帝在三個多月中所發動的大規模制度改革，是以康有為的〈日本明治變政考〉與〈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為藍圖，而以富強所代表的現代化為目標。表面上，這些改革仍然維持君主制度。但觀乎康有為自1895年以來對光緒皇帝所作的一連串建言，頒布憲法，建立議會，實現當時所謂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藍圖之中^⑤。易言之，百日維新是隱然朝向君主立憲政體推動，而君主立憲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之有異於傳統的普世王權是很顯然的。因此，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它顯示傳統的皇權體制已在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時代，不但中央皇權受到改革運動的震撼，皇權體制的社會與文化支柱也因改革運動的影響而受到侵蝕。如所周知，晚清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並未有基本的變化，士紳階層在社會上的主幹地位也並未動搖。發生變化的是士紳階層與皇權體制之間的結合。上面指出，太平天國運動是因清政府與地方士紳的合作而遭到撲滅。此後，地方紳權曾有着顯著的擴張，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團練、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工程，乃至少數新興工商企業均由地方士紳接管，而同時他們與中央皇權大體上仍然維持協調和諧的關係^⑥。但是1895年以後，這個協調和諧關係已逐漸不能維持。主要原因是士紳階層，特別是上層士紳之間出現了分裂。在戊戌時代，一小部分士紳開始質疑皇權體制，並公開向其挑戰，引起了士紳之間的思想對峙與政治鬥爭，也間接動搖了中央皇權在地方的社會基礎。

這種情形，在戊戌時代的湖南最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吳大澂任巡撫以來，即進行自強運動式的改革，1895年陳寶箴接任巡撫，加快這種局部緩進式改革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與士紳協調合作之下進行的^⑦。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運動進入湖南，梁啟超攜同一些康門弟子去長沙主持新成立的時務學堂，不但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學說，而且時有排滿的種族主義言論，對中國的君統以及清室的中央皇權作正面的攻擊。他們甚至效法明治維新以前的藩鎮倒幕運動，大膽主張湖南自立，擺脫清室中央的控制。從地方基層，徹底推行改革新政，以為未來改造中國的基石^⑧。

同時梁又與湖南士紳譚嗣同、唐才常、皮鹿門等人創立南學會，從思想上進行動員士紳階層，計劃發展紳權以為興民權的階梯。他們動員地方士紳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在長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縣，前後成立的學會有十三個之多。而南學會在鼎盛時期擁有了超過1,200名會員。因此，在1897與1898年之交，湖南的改革運動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紳之間也有擴散開展的趨勢^⑨。這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湖南官紳在十九世紀幾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都是以保守的立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國運動

由於一小部分士紳開始質疑皇權體制，並公開向其挑戰，引起了士紳之間的思想對峙與政治鬥爭，也間接動搖了中央皇權在地方的社會基礎。這種情形，在戊戌時代的湖南最為表面化。同時，梁啟超又與湖南士紳譚嗣同、唐才常、皮鹿門等人創立南學會，計劃發展紳權以為興民權的階梯。他們動員地方士紳的努力很有成效。

時，湖南官紳以維護名教的立場率先組織起來，變成鎮壓這個運動的主力。其後在1860年以後的30年間，他們也變成抵抗傳教士深入內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堅，如今在戊戌時代，激化的改革運動居然能在湖南士紳間引起相當的迴響，可見當時思想變化之劇。但這迴響也很快遭受到思想守舊與緩進的士紳的反擊，形成空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這些反對改革激化的士紳，一如他們前此反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基督教傳教士，是站在捍衛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立場，不但號召湖南紳民起來抗拒思想上的異端邪說，而且呼籲中央與地方政府予以鎮壓^⑩。在他們強大的壓力之下，改革運動很快地收場。

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雖然為時很短，但其意義卻極為重大。首先，它代表傳統皇權體制的社會基礎開始出現嚴重裂痕。這社會裂痕在戊戌時代雖然範圍不廣，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啟端，在轉型時代逐漸擴大，終於演成傳統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後全面解體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因。

再者，湖南改革運動也代表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與政治鬥爭的開始。由於當時反對康梁思想的士紳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區，廣泛地呼籲與游說官紳，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時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些官紳，在思想上組織起來，對康梁的改革運動進行思想圍剿。1898年春，張之洞發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中體西用」之說。表面上，他是為自強運動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總結與辯護，而實際上，他是認為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已因康梁的改革運動而受到威脅，他必須出來重新肯定這義理基礎^⑪。因此，張之洞在當時的立場與十九世紀中葉曾國藩的立場頗有相似之處。曾在太平天國運動威脅清廷存在之時，出面呼籲全國士紳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同樣地，張之洞之印行《勸學篇》也是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所不同的是，1895年以後的思想與政治環境已非40年前曾國藩所面對的。曾當年所面對的士紳階層的內部並未存有嚴重裂痕，因此士紳階層可以很快地響應曾國藩的呼籲而與政府通力合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張所面臨的則是一個已經開始分裂的官紳菁英階層。因此《勸學篇》出版以後，一方面固然受到許多官紳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維新運動的人士出面反擊，例如何啟、胡禮恆就曾在香港著文駁斥張氏的《勸學篇》。可以說，一個環繞康梁菁英集團與以張之洞為首的官紳集團，以湖南維新為導火線，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這個對峙與1895年以前因自強運動而展開的思想論戰不同，後者主要是清政府內部有關洋務政策的辯論，而前者則是攸關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的論爭，也是中國現代意識形態鬥爭的序幕。

戊戌時代，官紳統治階層內部出現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僅導致傳統皇權體制的社會基礎動搖，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礎也受到嚴重的侵蝕。一方面是西學在1895年以後大量的輸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學與「諸子學」的復蘇；另一方面，儒家內部的學說之爭，特別是康有為的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已把儒家義理的基本性格與政治取向弄得曖昧不明、啟人疑竇。儒家正統思想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以前那樣予皇權體制以有力的支持。這些發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因為它們是甲午以後所發生的思想文化鉅變的一部分。因此，在認

1898年春，張之洞發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中體西用」之說。實際上，他是要重新肯定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而張所面臨的則是一個已經開始分裂的官紳菁英階層。可以說，一個環繞康梁菁英集團與以張之洞為首的官紳集團，以湖南維新為導火線，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

識傳統政治秩序解紐的同時，我們必須對甲午以後改革運動如何開啟思想文化的新時代——轉型時代作一簡要的鳥瞰。

二 戊戌維新運動與思想轉型時代的序幕

所謂轉型的時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鉅變。就這些思想鉅變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轉型時代的起始點。

首先就新的傳播媒介而言，維新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劃時代的里程碑。在甲午年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出現，但數量極少。據統計，1895年以前全國報刊只有15家，而大多都是外籍傳教士或商人買辦的。但戊戌時代三年之間，據初步統計，數量躍至64家。同時，這些報刊的編者多半出身士紳背景，形成一種新的菁英報刊，影響也較前激增^②。

轉型時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新式學校的最初出現也是由於維新運動的刺激。在此以前，書院制度雖在晚清有復蘇的趨勢，但是學習課程仍以傳統科目為主，西學幾乎完全不見蹤影^③。維新運動期間，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廢科舉，立學校」為綱領的教育改革，而且直接間接地推動新式學堂的建立，開1900年以後新式學校大規模設立的先河。

同時，對現代新思想傳布極有貢獻的學會的出現也是以戊戌維新為分水嶺。在此以前，這種知識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至少在有清一代幾乎是絕迹，但維新運動期間，據大約的統計，學會的出現就有76個之多，是為轉型時代自由結社大量湧現的開端^④。

轉型時代的思想鉅變，不僅有賴於報刊、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傳播媒介，同時也與新社群媒介——現代知識份子有很深的關係。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從士紳階級分化出來，而這分化是始於維新時代。康梁以及他們的同路人，雖然大多數出身科舉，但他們的社會角色與影響，已經不是依附科舉制度與官僚體制，而是憑藉上述的制度媒介。再者，他們多已離開自己的鄉土社會，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大都市。同時，他們與現存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抵觸大於相互依存。此外，他們在思想上與心理上，已因外來文化的滲透與壓力，而開始徘徊掙扎於兩種文化之間。因此，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多少帶有一些曖昧性、游移性與矛盾性。這些特徵都是使他們不同於士紳階層而接近現代知識份子的地方。

由於這些社群媒體與制度媒介的湧現，西方文化在轉型時代有着空前的擴散，在其直接與間接影響之下，那時代的思想內容也有着深鉅的變化。這變化大約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國文化出現了自中古佛教傳入以後所未有的取向危機；另一方面，一個新的思想論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時期內逐漸浮現。而這兩方面的變化都是始於甲午以後所展開的維新運動。

所謂轉型的時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就這些思想鉅變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轉型時代的起始點。轉型時代的思想鉅變，不僅有賴於報刊、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傳播媒介，同時也與新社群媒介——現代知識份子有很深的關係。

由甲午至戊戌，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如康有為(圖右)、梁啟超(圖左)、譚嗣同、嚴復等，都對儒家的三綱說，特別是對其君統部分，作直接或間接批判(圖中為光緒帝)。這些批判綿延到五四爆發為激進的反傳統主義，也就是傳統儒家的規範倫理由動搖而全面思想破產。



(一) 維新運動與文化取向危機的啟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紀中葉進入中國以來，就不斷地給中國文化傳統帶來震盪與侵蝕。不過在1895年以前，這震盪與侵蝕大約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用晚清盛行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層次。但是1895年以後，主要由於維新運動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盪與侵蝕逐漸深入到體的層次，也即進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機。

這種取向危機首先是指道德價值取向的動搖。大約而言，傳統儒家的道德價值可分兩面：以禮為基礎的規範倫理與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倫理。由甲午至戊戌，雖然德性倫理尚未受到直接的衝擊，規範倫理則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戰。規範倫理是以三綱之說為核心。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都對這三綱說，特別是對其君統部分，作直接或間接批判。前面提到，這些批判以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為導火線，演成中國現代基本意識型態的論爭的開始。這場論爭綿延到五四爆發為激進的反傳統主義，也就是傳統儒家的規範倫理由動搖而全面思想破產。

戊戌時代，文化認同的問題也在中國教育階層間變成一個普遍的困擾。在此以前，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大體上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文化的核心思想並未受到嚴重的震撼，知識階層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個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與認同。但1895年以後，如上所指，一些傳統的基本價值規範已開始動搖，而就在同時，中國進入一個以西方政治與文化霸權為主的世界，中國人廁身其間，文化的自信與自尊難免大受損傷。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個認知與情緒雙方面的需要。文化認同問題因此變得較前尖銳而敏感。當時康門弟子梁啟超與徐勤以及譚嗣同重估傳統夷夏之辨的問題就是很好的例證^⑩。一方面他們坦白承認在這場辨認中，中國是否能夠在文化上免於夷狄的地位已

很成問題。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文化霸權與侵略，他們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國與保種之外，他們也要強調保教的需要^⑥。重估夷夏之辨與保教運動同時進行，充分顯示那時代的知識份子徘徊掙扎於兩個文化之間所感到的困境。

轉型時代，不但傳統儒家的基本價值受到挑戰，同時它的宇宙觀也受到嚴重的侵蝕。這宇宙觀的骨幹——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由一些基本「建構範疇」構成，如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及理氣等。轉型時代，隨着西方文化，特別是科學自然主義的流入與散布，這些範疇逐漸受到侵蝕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紳宋育仁已經看到這侵蝕所造成的文化危機。他在《采風錄》中曾經指出西學與西教如何對於傳統的建構範疇發生破壞作用，而這破壞也勢必動搖儒家的基本宇宙觀與價值觀^⑦。宋氏所指出的這種影響一旦發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義架構也勢必隨之動搖，因為這架構是由傳統的宇宙觀與價值觀縮合而成。隨着這一發展，中國人開始面臨一些前此很難產生的生命與宇宙的基本意義問題。由之而形成的困惑與焦慮就是我所說的精神取向危機。

因此，精神取向危機也是戊戌時代開始的。當時知識份子很盛行研究大乘佛學便是一個很好例證。這一發展反映儒家思想在當時已不能完全滿足一些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需要。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詩文都透露他們在追求佛學時所作的精神掙扎。

就戊戌時代或者整個轉型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在精神取向方面所作的掙扎與他們在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認同取向方面所展現的焦慮與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只有把這三方作綜合的分析，才能看到當時文化取向危機的全貌。

(二) 戊戌維新與新的思想論域：根據上面的分析，轉型時代，中國進入空前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面對這雙重危機，當時知識階層的思想回應自然是極為紛繁。在這些紛繁的思想演變中，逐漸浮現一個共同的論域 (discourse)，它的一些基本特徵在戊戌時代已經隱約可見。

首先是一種受傳統與西學兩方面影響的世界觀。就傳統的影響而言，它主要是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不但展現高度的積極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強烈的政治傾向^⑧。就西方思想的影響而言，它主要來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紀以來所持有的極端的人本意識 (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⑨與歷史演進觀念。這中西兩種影響化合為一種世界觀，我們稱之為歷史的理想主義。這份世界觀在當時常常凝聚為一個有着三段結構的時代感：一方面是對現狀有着強烈不滿的疏離感；另一方面是對未來有着非常樂觀的前瞻意識。而連接二者的，是對由現狀通向未來的途徑的強烈關懷。這種時代感在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的思想裏與幾份主要報刊裏已清晰地展露。

隨着這份歷史理想主義的世界觀而來的幾個觀念，對轉型時代也有重要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群體意識。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為在戊戌時代提出的一個觀念：「治天下以群為體，以變為用。」^⑩從那個時代開始，相對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時間，這個觀念的內容可以有不同。「群」可以指國家，或民族，或種

在戊戌時代或者整個轉型時代紛繁的思想演變中，浮現了一種受傳統與西學兩方面影響的世界觀。就傳統的影響而言，它主要是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有一強烈的政治傾向；就西方思想的影響而言，它主要來自西方近代的極端的人本意識與歷史演進觀念。這中西兩種影響化合為一種世界觀，我們稱之為歷史的理想主義。

族，或階級，或理想的大同社會；「變」可以指歷史演進觀，也可以代表傳統儒家視宇宙為一生生不已的過程。但這整個觀念所表現的一種思想模式與關懷，則是貫串整個轉型時代乃至整個現代思想的一個基本線索。

其次是新的個人自覺觀念，後者是從傳統儒家思想承襲了人為萬物之靈的「人極意識」，而拋棄了傳統人極意識後面的超越的天道觀念，同時它也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所謂「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現的戡世精神，認為人已取代神為宇宙萬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無限，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宇宙^②。總之，這種「浮普精神」很容易與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湊泊，化為現代思想中的人極意識。而它的最初出現就是在戊戌時代。當時譚嗣同與梁啟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與戡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這份現代的人極意識，而形成個人自覺的核心思想^②。

「浮普精神」是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現的戡世精神，它很容易與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湊泊，化為現代思想中的人極意識。戊戌時代，譚嗣同與梁啟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與戡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這份現代的人極意識，而形成個人自覺的核心思想。

除了群體意識與個人自覺意識之外，尚有一個也是隨着歷史的理想主義世界觀而出現的思想趨勢：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時代感。後者一方面投射強烈的前瞻意識；另一方面反映對現實的疏離與不滿，使得這份時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現實走向未來這個途徑問題上。轉型時代發生的改革與革命論爭，就是以這途徑問題為出發點。隨着革命的聲浪日高與革命的觀念逐漸深化與擴大，一種激化的現象於焉出現。

這激化的趨勢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時代。上文曾論及湖南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激化現象，根據當時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報導，梁啟超與其他康門子弟如葉覺邁、歐榘甲、韓文舉等，在赴湖南參加改革新政前，曾協議準備走激進路線，甚至考慮採取革命立場^③。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運動以前所寫成的《仁學》，不但有排滿反清的主張，而且是以衝決網羅這個觀念為基調。這基調極富感性涵意，而此涵意與日後激化趨勢中的革命觀念極為合拍。因此我們可以說，譚的思想中有強烈的革命傾向也不為過。無怪乎，轉型時代革命派的一些激進份子如鄒容、陳天華、吳稚暉乃至五四時代的李大釗都奉譚嗣同為典範人格。這些都顯示：戊戌時代的改革運動已隱含一些激化的趨勢。

上面我大約地說明了戊戌時代開始出現的歷史理想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群體意識、個人自覺與激化趨勢。以這些觀念思想趨勢為基礎，在當時展開了一個新的思想論域。這當然不是那時代唯一的思想論域，但卻是當時影響日增而且對後來二十世紀思潮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的論域。

總之，不論就這新的思想論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機，或者思想的制度媒介與社群媒介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開端，同時如第一節所分析，它也是近現代政治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它所開啟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仍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雙重危機。從這個角度去看，百年前維新運動距離我們似乎很遙遠，但卻又不是那樣遙遠。就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困境而言，中國仍未完全脫離戊戌維新所引進的危機時代。

註釋

①⑤⑦⑧⑨⑩⑬⑭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1-93; 323-27; 360-18; 303-309; 308-309; 333-36; 330-31; 331-32.

② Chü-fang Yü,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1-37; Richard Shek, "Taoism and Orthodoxy: The Loyal and Filial Sect", chap. 4, in *Heterodox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Kwang-ching Li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③ Kwang-ching Liu,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China in Crisis*, ed.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109-112.

④ Barry C. Keenan, *Im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3-4, 142.

⑤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1-225;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01.

⑩ 同註①，頁309-18。湖南官紳攻擊當時激進思想的文章收於蘇輿編的《翼教叢編》，讀者可參閱。

⑪ 同上，頁312-14。《勸學篇》是於1898年春以分期連載的方式登載於湘學報。

⑮ 梁啟超：〈春秋中國夷狄辨序〉，《飲冰室文集》，第二冊（台北：中華書局，1960），頁48-50。

⑯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六冊，頁67-70。

⑰ 宋育仁：〈采風錄〉，「質學叢書初集」（武昌，1897），「記三」，頁819；「記四」，頁34-35。

⑱ Chang Hao,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the Confucian Ideal of Ching-shih",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ed. Tu Wei-m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2-91.

⑲ Charles Taylor, "Socialism And Weltanschauung", in *The Socialist Idea: a Reappraisal*, ed. Leszek Kolakowski and Stuart Hampsh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49-50.

⑳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317。

㉑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u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38-39.

㉒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聯經出版社事業公司，1988），頁112-14；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88-90, 168-89.

㉓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一（台北：世界書局，1959），頁44。